

English

下载中心

首页

网站地图

关于 IWEP

研究课题

研究人员

研究成果

数据库

出版物

媒体报道

研讨会/讲座

期刊文章选登

[HTTP://WWW.IWEP.ORG.CN](http://www.iwep.org.cn)

《世界经济》2005年第9期

[\[PDF全文下载\]](#)

进口国制度安排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

潘向东 廖进中 赖明勇

[内容提要] 以往关于制度因素对贸易流量影响的研究，只停留在对单个制度变量探讨的层面上，为弥补这种不足，本文采用CES函数，推导了包含制度安排变量的引力模型，然后采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该引力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就制度安排总体而言，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进口国制度安排的敏感性要高于中国、韩国和巴西，五个国家对进口国非正式约束制度安排的敏感性均较强；就各项制度安排而言，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进口国正式约束的制度安排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较强，而中国和巴西对进口国实施特征方面的制度安排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较强。同时各项制度安排对不同国家不同大类的高技术产品的影响表现出很强的相异性，这反映了各国各大类高技术产品出口各自的特征。

[关键词] 引力模型 制度安排 高技术产品出口

[作者简介] 潘向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夏证券研究所博士后工作站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100010

电子信箱：panxdong@hotmail.com；廖进中、赖明勇：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一 文献概述

自Tinbergen (1962) 和 Poyhonen (1963) 从计量的角度提出运用牛顿物理学中的“引力定律”来研究国家间双边贸易流量的引力模型以来，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求它的理论基础。Linnemann (1966) 试图从瓦尔拉均衡系统寻求其理论解释，但在瓦尔拉均衡模型中，贸易流量包含了太多的解释变量而背离了引力模型的初衷；Leamer与 Stern (1970) 以Savage与 Deutsch(1960) 的交易模型为基础来推导引力模型，可惜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模型与经典贸易模型联系起来；Leamer(1974) 在计量分析中用引力模型和赫克歇尔-俄林(H-O) 模型一起去分析解释变量，却没有整合两者相近的理论。

Anderson (1979) 在假设贸易产品的差别性前提下(“Armington假设”，Armington, 1969)，运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和CES效用函数推导了引力模型。Bergstrand(1985) 遵从Anderson的思路，运用CES效用函数推导了包括价格指数的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同时他运用经验数据检验了商品非完全替代假设。在他们的模型中距离对贸易的影响为负，同时假定交易成本像“冰山”一样，在运输过程中会“融化”，从而得出交易成本随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但交易成本与距离之间实际关系直到1999年才由Hummels (1999) 做出强有力的证明。Deardorff(1998) 仍遵从Anderson (1979) 的思路，以H-O模型为基础，推导了无贸易壁垒和有贸易壁垒情况下的引力模型，并得出两条重要结论：简单的引力模型能从一般的贸易理论模型中推出；由于引力模型具有许多贸易模型的特性，可以用引力模型来检验那些模型(如垄断竞争模型)。Eaton和 Kortum(1997) 则遵从Dornbusch等 (1977) 的思路，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推导了包含技术水平和工资的引力模型，由于该文主要是以引力模型为基础来探讨技术创新对贸易的溢出效应，所以它没有对包含贸易壁垒等变量的引力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Helpman (1987) 利用引力模型与垄断竞争模型的一致性, 把引力模型的经验结果作为支持垄断竞争模型的经验证据。Bergstrand(1985) 则运用垄断竞争模型来推导引力模型以取代以往运用“Armington假设”的推导, 从而使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实现了从新古典贸易理论向新贸易理论的跨越。研究者们为使引力模型的拟合程度与现实更加贴近, 在引力模型的基本框架下, 把一些影响贸易流量的经济变量或虚拟变量逐步地纳入回归方程, 这些变量主要包括: 人口和领土(Linnemann, 1966), 开放度(Lawrence, 1987), 区域性贸易协议(Frankel et al., 1997), 边境(McCallum, 1995), 语言(Frankel and Wei, 1993), 货币联盟及殖民关系(Tesar and Werner, 1995), 环海及债权谈判(Rose, 2002)等。在这些变量中除边境变量得到了Anderson和Wincoop(2003)强有力的证明之外, 其他变量的纳入并没有得到理论支持。而开放度、区域性贸易协议、边境、语言和环海等变量对贸易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贸易的交易费用, 而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低主要取决于各国的制度环境(杨小凯、张永生, 2001)。

由于制度安排难以量化, 后续研究者并没有把制度安排这一重要因素系统化的纳入引力模型来进行研究。这些变量的缺乏, 会使我们对现实的解释, 特别是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解释显得乏力。本文将沿着Anderson和Deardorff的思路进一步深化, 把制度安排变量纳入模型, 然后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近六年来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数据检验制度安排对一国出口流量的影响。

二 引力模型

.....

三 模型检验

.....

四 结 论

尽管一些研究者将一些制度变量(如语言)纳入引力模型之中进行了回归分析, 同时也尝试了把一些虚拟变量纳入理论模型进行探讨, 但他们并没有把制度安排这一变量纳入理论模型之中, 并进行系统的回归检验。本文尝试性的把这一变量纳入理论模型, 并采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 进口国的制度安排对两国间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是显著的。从纳入模型方面来说, 本文是从影响两国间贸易的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制度安排对一国商品出口的影响, 并没有考虑一国制度安排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又会影响到两国间的贸易流量。在把制度安排变量纳入模型并进行经验分析时, 本文考虑的是进口国的制度安排对出口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并没有考虑出口国的制度安排对该国出口的影响, 这种影响肯定很显著, 其程度如何值得后续研究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国的制度结构是由具有不同地位和作用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它们的实施机制耦合而成的制度体系, 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本文把各项制度安排纳入统一回归方程, 比较它们对五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 探讨各项制度安排对各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绩效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回归结果显示, 尽管各项制度安排在各高技术产品贸易中的功能存在相似性, 即降低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但它们对各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绩效作用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制度安排总体而言, 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进口国制度安排的敏感性要高于中国、韩国和巴西, 五个国家对进口国非正式约束制度安排的敏感性均较强。具体而言, 美国和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进口国正式约束的制度安排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较强, 而中国和巴西对进口国实施特征方面的制度安排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较强。这就为我们在制订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策略提供借鉴, 就短期而言, 应该更注意交易国的实施特征方面的制度安排, 就长期而言, 我们应注重本国制度环境的改善, 特别是正式约束方面的制度安排的改进。

(截稿: 2005年5月责任编辑: 宋志刚)

推荐好友

相关文章

▣ 程惠芳、阮翔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世界经济》2004年第11期 (2007-1-3)

▣ 盛斌、廖明中 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 《世界经济》2004年第2期 (2007-1-3)

本站的署名文章均属作者本人的观点。希望转载时，请事先与我们联系。

[院首页](#)

[网站声明](#)

[会员登录](#)

[联系我们](#)

[下载中心](#)

[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Copyright (C) 2002-2008 中企动力提供技术支持 请使用 1024*768分辨率

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编:100732 电话:010-85196063 传真:010-65126180 联系本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编号:京ICP备06059776号